

“中国经济前沿”丛书
CHINA UPDATE BOOK SERIES

CHINA'S NEW PLACE IN A WORLD IN CRISIS

ECONOMIC, GEOPOLITICAL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

——经济、地缘政治和环境的视角

〔澳〕郢若素 (Ross Garnaut) 宋立刚 胡永泰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E PRESS

“中国经济前沿”丛书
CHINA UPDATE BOOK SERIES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

——经济、地缘政治和环境的视角

CHINA'S NEW PLACE IN A WORLD IN CRISIS
ECONOMIC, GEOPOLITICAL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澳〕郜若素 (Ross Garnaut) 宋立刚 胡永泰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地缘政治和环境的视角/
(澳) 郢若素 (Garnaut, R.), 宋立刚, 胡永泰主编. —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4

· (中国经济前沿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1343 - 3

I. ①全… II. ①郢… ②宋… ③胡… III. ①金融危机 -
影响 - 经济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4543 号

“中国经济前沿”丛书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

——经济、地缘政治和环境的视角

主 编 / [澳] 郢若素 (Ross Garnaut) 宋立刚 胡永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财经与管理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26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项目经理 / 周 丽

责任编辑 / 恽 薇

责任校对 / 韩海超

责任印制 / 蔡 静 董 然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3

字 数 / 405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343 - 3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经济与商业项目非常感谢
澳大利亚政府发展援助局 (AusAID)
对“中国经济前沿”丛书所提供的资助，
以及力拓公司 (Rio Tinto) 通过力拓公司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中国合作项目 (Rio Tinto-ANU China Partnership)
对此所提供的资助。



作 者

(以章节为序)

Ross Garnaut: 墨尔本大学校长特聘研究员和经济学教授,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特聘教授, 堪培拉。

胡永泰: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布鲁金斯学会, 华盛顿特区;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陈 平: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 北京;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 上海。

马国南: 国际清算银行, 香港。

周海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Hugh White: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卫研究中心, 堪培拉; **Lowy** 国际政策研究所, 悉尼。

W. Max Corden: 墨尔本大学经济系, 墨尔本。

黄益平: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Crawford** 经济与政府学院, 堪培拉。

彭 程: 花旗银行, 中国。

沈明高: 《财经》杂志, 北京。

王小鲁: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北京。

樊 纲: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北京。

肖 耿: 清华大学布鲁金斯研究中心, 北京。

杨秀科: 清华大学布鲁金斯研究中心, 北京。

Anna Janus: 清华大学布鲁金斯研究中心, 北京。

Prema - chandra Athukorala: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 Arndt - Corden 经济分院, 堪培拉。

Kyoji Fukao: 一桥大学经济学院, 东京。

袁唐军: 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 东京。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 北京。

王德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 北京。

曲 玥: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 北京。

孔 涛: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堪培拉。

孟 昕: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堪培拉。

张丹丹: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堪培拉。

Huw Mckay: 西太平洋 (Westpac) 银行, 悉尼。

宋立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 (Crawford) 经济与政府学院, 中国经济与商业项目, 堪培拉。

Will Martin: 世界银行, 华盛顿特区。

陈春来: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经济与政府学院, 堪培拉。

Peter Drysdale: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经济与政府学院东亚经济研究局, 堪培拉。

Christopher Findlay: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院, 阿德莱德。

张永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Stephen Howes: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经济与政府学院, 堪培拉。

薛进军: 名古屋大学经济研究院, 东京。

目 录

第一篇 中国在世界中的新地位

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世界地位	Ross Garnaut / 3
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胡永泰 / 15
有效市场的失败与生机市场的发展	
——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的一个新视角	陈 平 / 30
中国对外财富的增长：演进、成因与展望	马国南 周海文 / 52
中国的崛起对地缘战略的影响	Hugh White / 78

第二篇 全球衰退中的宏观经济调控

中国的汇率政策、经常账户盈余和全球不平衡	W. Max Corden / 93
全球危机中的宏观经济表现	黄益平 彭 程 沈明高 / 106
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与中国的结构失衡	王小鲁 樊 纲 / 117
中国国有企业之谜：改革动力及影响	
.....	肖 耿 杨秀科 Anna Janus / 132
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	Prema-chandra Athukorala Kyoji Fukao 袁堂军 / 151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域延续	
——大国雁阵模型分析	蔡 昉 王德文 曲 玥 / 173
经济衰退对农民工的影响	孔 涛 孟 昕 张丹丹 / 190

第三篇 经济一体化

中国作为制造强国的全球意义 Huw McKay 宋立刚 / 213

中国的纺织品与服装贸易及其全球性调整 Will Martin / 241

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入 陈春来 / 258

中国对澳大利亚自然资源产业的
直接投资 Peter Drysdale Christopher Findlay / 276

第四篇 环境与气候变化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一个理论框架和
解决方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 311

中国能否挽救全球气候变化谈判 Stephen Howes / 328

中国向低碳经济增长转型 薛进军 / 345

第一篇

中国在世界中的新地位

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世界地位

Ross Garnaut

在过去的一年中，世界发生了转型，而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这种要求变革的压力既源自有史以来最为严酷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源自出口贸易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出现了世界经济史上空前的大幅衰退。

世界正处于变革之中，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变化，则比其本身及其经济前景的变化更加引人注目。在历经了充满挑战的一年之后，中国确保了不断强劲发展的势头。虽然人们曾对这种发展势头是否能够持续存有疑问，但如今已有充分理由使我们相信事实将对该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超乎中国及其国际伙伴对全球治理问题的既有思考与实践，这场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已经加速了中国作为重要力量参与国际事务的进程。

一 本年度（2009）论坛主题

正如 2008 年度中国经济前沿论坛的论文集所显示的那样，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繁荣于 2008 年达到了顶点（Song 和 Woo，2008）。那时候，世界资源和粮食的价格处于创纪录的高水平上，而发展中国家则于 2007 年实现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劲的增长；尽管世界经济在 2008 年 9 月以后出现了崩溃，但中国仍实现了超过 13 个百分点的增长，印度实现了超过 9 个百分点的增长，非洲实现了超过 6 个百分点的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则超过了 8 个百分点。

进入 2009 年，中国和其他大型成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虽然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减缓，但势头仍然强劲；那些后工业化国家和较为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问题重重经济前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可被追溯到从 2006 年就开始显现出来的美国金融系统漏洞，而危机本身则真正开始于 2008 年 9 月间许多华尔街投资银行的突然崩溃；那些曾能得心应手地使用中国巨额贸易盈余去填补美国和澳大利亚巨额经常性支付赤字的国际财政中介机构，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而纷纷迅速解体（Garnaut，待刊稿）。

金融危机激发了全球衰退。国际经济疲软所带来的衰退压力，促使中国强化了先前实施的紧缩性货币政策，而该政策原本是为了结束一年多来使中央政府感到担忧的高通货膨胀率水平而设计的。这种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使得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的泡沫破裂，并导致在主要城市中快速膨胀的不动产市场陷入停滞。与此同时，后工业化国家突然削减了从中国进口货物的订单，导致生产出口货品的工厂关停，促使出口导向型企业放弃扩张计划，并迫使数以千万计的在城市工厂里打工的人们返回中国农村的乡镇、村庄和田野。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中国在 21 世纪初的发展战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一些长期性问题，突然变得具有紧迫性了。那么，中国能否抓住国内市场中的机会转变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同样强劲的增长呢？当国际经济发展限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巨额贸易顺差时，中国能否在短时间内动员足够多的资金加以应对？

关于中国在 21 世纪初的发展战略能否持续的其他长期性问题，同样需要回答。在燃料、粮食和纺织原料的成本与价格随全球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世界能否生产并提供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自然资源？中国与世界能否找到新的发展途径，使经济产出不再依赖于排放温室气体，以降低日益激增的气候变化风险呢？

在上次中国经济前沿论坛年会与这次年会之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纪念日。1978 年 12 月，邓小平果断实施了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两项新政策。此后，改革每过 10 年都会面临一场危机；改革开放 30 年来，一共面临过 3 次重大危机。1988 年末，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以及领导层内部对如何应对这种情况而产生的分歧，使得改革遭遇到了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实质性挑战。1998 年末，中国已经开始着手应对东亚金融危机，但其高风险政策的后果仍然不甚明晰。中国政府当时维持了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并且采用扩大政府支出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来应对出口萎缩和外汇储备锐减的状况。如今，中国启动了新一轮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支出政策，以应对超越地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Garnaut，2009）。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中国就启动了规模远大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财政支出计划，这是全球各国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的最大一笔财政支出。而中国相应的货币支出则更为庞大，对国有银行严格的限制性政策在 2008 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开始逆转，取而代之的是旨在鼓励扩张的新指导政策。

现在实施扩张性战略的风险，远远低于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因为中国目前格外庞大的外汇储备说明这个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受到的冲击如今已完全恢复；同时，经过东亚金融危机的检验，凯恩斯主义政策被证明是成功的，而这增加了中国政府采用扩张性政策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信心。

至 2009 年 1 月，及时的巨额财政支出和货币支出已收到了显而易见的重大效果。目前看来，中国在 2008 年第四季度到 2009 年第四季度之间的增长，似乎仍有可能与金融危机发生前几年的平均年度增长速度相当。当然，中国的出口仍很脆弱，而其增长动力主要源于扩大内需。中国的净出口额将在 2009 年保持稳定，而境外账户则会成为影响中国增长的负面因素。中国将为稳定全球经济发挥积极作用。而中国强劲反弹的进口需求，则提升了在 2008 年下半年一度低迷的能源与矿物价格，使之回复到 20 世纪后半叶平均真实价格水平与经济繁荣时最高价格之间的中位水平。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围绕中国在 21 世纪初的强劲增长是否具有持续性这个核心议题，产生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这种依靠出口和贸易顺差而实现的增长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一方面，强劲增长的出口额与不断上升的外贸顺差将为中国贸易伙伴带来巨大的结构性压力；而在国际贸易体系比较脆弱的时候，这种压力就会引致对方出台带有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政策。另一方面，入超国家的贸易盈余其实是出超国家的贸易亏损，而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就是资本将流向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出超国家。因此，中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有利于美国和其他对华贸易入超国家，使这些国家不必在增加税收、提高利率和削减包括国防经费在内的公共开支之间进行艰难抉择。一些研究者认为，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还会延滞那些必需的调整，这些调整迟早都要进行，而一旦被耽误，就会造成更加悲惨和昂贵的后果。

第二，这种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增长将对本地、本国、本地区乃至全球的环境带来多大程度的压力。中国的发展越来越被认为对日益凸显的气候变化危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增长的外部代价需要整个国际社会来承担，而解决任何全球性问题也都离不开包括中国在内的重要经济体的共同参与

(Garnaut, 2008)。

第三，在 21 世纪初，中国既有的增长模式伴随着巨大且日益扩展的收入分配差距。在改革初期，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因国家致力于解决农业和其他农村发展问题而有所降低。但进入 21 世纪以后，改革则偏向于提高那些相对幸运的城市居民——特别是富裕的沿海城市中的居民——的收入，而这种偏向性的一个首要表现，就是这部分居民更容易从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型项目中获得高额薪水和充裕资金。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感到自己无法公平地分享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丰裕成果，这成为那些反对政府决策等抗议活动带来的社会冲突的根源。

第四，中国在全球市场上为购买粮食、矿产和能源而急剧增长的支出是否具有效率。在如今这个全球经济衰退的时期，中国的需求对空前高涨的粮食、矿产和能源价格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不断扩张的经济体，中国如果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是否会不断抬升这些物品的价格，最终使它们与基于全球尺度计算的收入标准和生活条件不相适应呢？中国只有平稳地对货物、资本、交通以及企业进行市场运作，才能较为满意地解决粮食和资源的供给问题。

那么，这些隐患能否在不伤及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随着形势发展而得以自我纠正呢？

上述四个方面关于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彼此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中国贸易盈余的另一种面相，就是其令人惊诧不已而且还在迅速攀升的储蓄率水平；中国的储蓄率水平甚至远远超过其非同寻常的高投资率水平。而造成储蓄率水平居高不下的的重要原因，则在于收入不平等，因为较之穷人，富人可以将其收入中更高比例的财富存储起来。国有企业的高利润和高收入是造成日益增加的收入不均的两大要素；而这些企业将很大比例的收入投资于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则强化并且恶化了收入不均的状况，并导致了对自然环境的压力和对矿产与能源的需求失调。

早在全球危机发生之前，如何通过战略转型减轻上述四个方面的压力，就已是广受关注的议题。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相继发表声明，强调扩大财政支出，促进农村地区发展，要求向卫生和教育等公共事业倾斜分配资源。新增的财政支出将重点关注环境保护领域，中国作为全球变暖问题的受害者和潜在解决者的地位，亦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官方注意。而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将伴随着对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控制与削减。

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前，推动落实这些包含良好意图的官方声明的努力，仅仅取得了很小的进展。2005 年 7 月以来的 3 年内，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大约上涨了 20%，加之对农村地区公共投资规模的不断增加，中国的对外贸易平衡得到了改善，不平等程度有所降低，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压力也减轻了一些。

有观点认为，促使实现中国高速发展的既有模式可以自行解决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并保证中国经济继续增长。最迟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稀缺的状况，实际工资水平因此得以显著提升，而这种趋势在 21 世纪初则变得更加明显。这拉动了消费水平的增长，潜在地降低了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和进口加工产品的竞争力，并减少了对重工业的投资份额，从而减轻了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在经济危机发生以前，上述观点都仅仅只是猜测，未曾成为现实。那时，生产率、产量和收入的增加幅度高于实际工资和消费的增长程度，而投资回报率水平则持续居高不下，并且不断增长。因此，只有产量增长率、收入增长率以及市场进程中的实际工资增长率统统达到更高的水平，才能消解中国的储蓄过剩与收入不均。但在缺乏经济调整手段的情况下，即便是伴随着结构转型和实际工资水平迅速提高，也将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

如今，全球金融危机使得重大而迫在眉睫的结构调整成为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前提。许多国家正在迅速消减与投资相关联的储蓄赤字，因为这么做既是对家庭与企业的谨慎回应，也是为了应对那些曾将财富从出超国家平稳转移到入超国家的银行倒闭所带来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再也无法依靠其快速增长的净出口额、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来保证持续增长。倘若依然希望实现快速增长，就必须迅速拓展国内市场。中国私人消费的增长率有限，因此在拓展国内市场时（尤其在早期阶段）就必须采取公共投资或公共消费等公共支出和私人投资的形式。投资在中国产出与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似乎还要从目前的水平上增长一段时间，但如果支付得当，把握住目前依然存在于中国市场内的大量高产出与高利润的投资机会，也许中国就能获得比危机前更高的产出增长率。而更高的增长水平则将迫使实际工资提升，并促使关键结构调整。

中国已经参与到承担全球金融危机后果的队伍当中。虽然世界仍在发展，但中国的贸易额与国际收支盈余却遭受了重创。不过，随着时间流逝，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似乎也将得到改观，虽然这种改观可能无法在短期内一蹴而就。

对增长不平等的早期调整，以及减少高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源和环境压力，都要求配套政策得以有效实施；而削减收入不平等，则要求使用大部分新增公共支出集中改善低收入群体和农村社区在教育、医疗、交通和通信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若想在国际社会承担起与其经济持续迅速增长相一致的、旨在减少人为造成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就必须出台税收和管制等较为慎重的减排措施，并且加速发展应用低排放科技的新型商业模式。而若想解开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死结，则需要限制那些消耗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模式。

中国刺激经济增长的早期一揽子方案中就含有旨在通过增加公共投入来改善收入分配与环境问题的因素，而这些内容在后续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得到了扩展。

中国以及其他大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 21 世纪初的持续快速增长，正在不断改变着国际经济与战略的平衡。全球经济结构以及终极战略影响的变迁，正将国际社会推向一个“四极世界”。主要国际目标的实现，需要美国、欧盟、中国和印度这四个大国进行合作；而针对绝大多数事务的有效国际行动，则需要在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下由四大主要力量联合开展。

这个世界如今已被改变得太多，以至于需要一些时间来发展那些能够使国际合作变得有效的观念和制度。不过，全球金融危机并未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方向，通过大幅降低主要后工业化国家的增长速度，同时较少地影响主要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反而加速了这种变动，这将使得用于发展并完善国际新秩序所需道统和制度的时间大为缩短，而更短的发展时间则意味着更有可能出现毁灭性的错误。

二 本书主要论题

本书中各篇文章所涵盖的论题包括：全球金融危机如何影响中国增长的前景？金融危机本身以及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努力将对中国发展进程中那些重要的内部问题产生何种影响？金融危机本身以及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努力将如何影响正在迅速显现出来的、促使中国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发挥更大作用的国际新秩序？

本文以后的三篇文章将讨论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所带来的观念冲击，并思考推动新的世界秩序运转的必要国际制度。

胡永泰注意到，此次危机宣告了那些基于华盛顿共识的全球性金融机构

在 10 年以前针对东亚金融危机所得出的政策建议彻底破产，促使国际社会寻求替代性的区域金融合作机制。胡永泰赞同建立可以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多元化机构，并认为其中部分机构应当具有东亚渊源。他的实践建议则相对折中，即支持成立一个有美国参与的亚洲金融机构，以防止该地区患上“金融危机传染病”。东亚经济体强劲的储备能力，使它们在本地区的有效合作中处于优势地位。

许多章节讨论了一个常被论及的问题，即中国的发展是否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陈平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先行者。他认为对金融市场不尽完善的经济和金融研究是导致该问题的核心所在，并指出一些美国研究者误将中国的低储蓄率、高外贸盈余、低汇率水平或者中美贸易不平衡作为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他看来，治愈金融危机的关键，在于对后工业化国家实施金融改革，而目前应对全球衰退的手段则过于无力，可能难以达到目标。

Corden 也对该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并总结得出：就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而言，中国的贸易出超带来了一些细微冲击，但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既有缺陷却更加难辞其咎。

马国南和周海文、Corden、王小鲁和樊纲都讨论了潜藏在中国贸易出超背后的令人迷惑却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的储蓄率水平格外之高。Corden 在文章中简要地报告了相关数据，这些数据显示：中国异常庞大的贸易与现金账户出超，只不过是 2005 年之后才出现的现象。他注意到，中国的家庭储蓄水平较高（尽管储蓄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往往不高，却占到了 GDP 的 15%），但较之占 GDP 28% 的企业储蓄水平来说，家庭储蓄水平尚算适度。马国南和周海文指出了自 2002 年起开始显著增长的政府支出（用于减免债务）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而王小鲁和樊纲则探究了严重且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不均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

马国南和周海文仔细研究了导致近些年来储蓄比重上升的因素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认为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导致近些年来高额储蓄的原因，且其重要程度正在日益增强。他们总结得出，虽然中国的境外账户不大可能重新转为赤字，但外贸盈余可能无法再继续增长，甚至会出现衰减。肖耿、杨秀科和 Janus 则分析了决定国有企业收益率的因素，并指出该因素正是造成中国不平等程度和储蓄率水平不断升高的原因之一。因此，他们建议削减国有企业的特权地位，并提高其运行效率。

许多文章注意到，无论中国近些年的增长是否依赖于不断增加的对华有利的净出口贸易，这种现象在金融危机后将不可能继续出现。后工业化国